

谋杀不是政治武器*

Mord darf keine Waffe der Politik sein

Herbert Marcuse

发表于：《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 第 12 期 (1977 年秋季号)，第 7-8 页。

在就西德的恐怖主义表明立场时，左翼首先必须对自己提出两个问题：恐怖主义行动是否有助于削弱资本主义？从革命道德的要求上，这些行动是否正当？对于这两个问题，我都必须给出否定的回答。

肉体上消灭个别个体，即使是最显要的人物，并不会破坏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运行。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强化它的镇压潜力，而（这是决定性的一点）并不引发对镇压的反抗或者引起政治觉悟。

显然，恐怖行动的受害者代表了整个制度，但他们仅代表它。也就是说，他们是可以被替代的，可以被交换的。招募其接班人的储备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鉴于国家机器的集中权力和脱离群众的恐怖主义团体的贫弱之间存在压倒性的不对称，这种试图在统治阶级成员中制造不确定性和焦虑的尝试很难算得上是一种革命成就。在联邦共和国如今的普遍形势（这种预防性反革命的状态）下，左翼如此挑衅国家权力对自身是毁灭性的。

这里也许存在一种情况，消灭一个支持镇压政策的人确实会改变整个制度——至少改变它的政治表现——并且解放各种形式的压迫。（例如在西班牙成功刺杀卡雷罗·布兰科，或者希特勒的死也许就产生过这样的影响。）但在这两种情形下，整个制度已经处在于一种瓦解阶段中，而这种状态显然不存在于当今西德。

然而，马克思社会主义不仅遵循革命实用主义的法则，还遵循着革命道德的法则。它的目的，即解放个体，必须蕴于实现这以目的的手段之中。只要它还有可能，革命道德就要求公开的斗争，而不是密谋和偷袭。公开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在西德——以及别处——如今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反对派

*本文曾发表于德国周报《时代周报》(*Die Zeit*)，1977 年 9 月 23 日。

很大程度脱离了工人阶级。学生运动、资产阶级的“脱阶级”激进分子和妇女们都在寻找他们自己的斗争形式。它们的政治孤立带来的挫败是难以忍受的。这导致了针对个体的恐怖行动，这些行动来自孤立的个人或者孤立的小组。

通过将斗争个人化，恐怖主义者必须为他们的行动负责并接受审判。那些被选作谋杀目标的资本代言人需要为资本主义负责任——就像希特勒和希姆莱要对集中营负责一样。这意味着这些恐怖行动的受害者并非无辜——但他们的罪恶只能通过废除资本主义本身来偿还。

当今西德的恐怖活动是否应该被视为学生运动在更严峻的镇压下，采取了其他的政治策略的一种合法延续？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恐怖主义与六十年代的运动有一个明确的决裂。议会外反对派（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PO），尽管对其阶级基础存在种种保留意见，但它是一场国际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有着国际性战略的运动。它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即，它宣告了为“具体的乌托邦”而斗争的必要。它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在质上不同于并超越了之前所有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当“具体的乌托邦”已经成为了真实的可能。这一运动不回避公开的对抗，但它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拒绝了密谋式的恐怖主义。今日的恐怖主义并非德国新左翼的遗产。相反，它仍然为它期望推翻的旧社会秩序所约束。它使用的手段会阻碍它的目的。与此同时，它分裂了左翼，恰恰就在这个需要团结所有反对力量的当下。

正因为左翼拒绝这种恐怖，所以不必加入资产阶级对激进反对的谴责运动中。左翼以社会主义斗争的名义表达它自主的判断。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左翼声张：“不，我们不需要这种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损害了这一斗争，而这种斗争也是他们自己的斗争。他们的方法不是解放的方法——甚至不是在一个被动员起来镇压左翼的社会中求生的方法。

luislee 译